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发表在1843年1月出版的《莱茵报》上，它是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的第二年发表的文章。马克思写此文的目的对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对《莱茵报》上记者发表的两篇文章提出无理指责并要求报刊作出解释的回应。马克思以摩泽尔记者的名义，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材料，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生活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极其详尽的事实和无可辩驳的论证对总督的指责以未署名的形式作出了客观的答复，从而揭露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政府脱离人民的管理机构的“官僚本质”。这篇文章也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调查研究的开篇之作，表明了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逐步确立起为受苦难的下层民众代言的鲜明立场。

受到莱茵省总督的非难

1842年12月，《莱茵报》记者彼·科布伦茨在《莱茵报》第346和348号登载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的两篇文章。文章表达的观点，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柴荒问题；另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特别关注1841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以及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较自由的行动。两篇文章相比，第二篇言辞更为犀利，是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向当地政府发出求助的强烈呼声。记者只是在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但哪怕“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达“在贫困中产生的民众语言”，都被官方认为是不真实的，甚至把葡萄种植者的无奈求助看作是无理取闹。



曾国藩（1811—1872年），谥号“文正”，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相比于曾国藩的政治、军事成就，其流传下来的著作并不多，最为有名的就是这本时间跨度逾30年、总数超千封的书信集——《曾文正公家书》。但仅就这一部家书即让曾国藩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赞誉，而其中蕴含的治学之道，至今依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

学以“格物”和“诚意”

曾国藩生于封建末世湖南一普通农家，经历了10多年不问世事的寒窗苦读阶段，科举成名后步入政治生涯，他才真正接触社会实际，逐渐认识到当时士子学人治学目的的空洞和无用。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今人读书皆以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

从30岁立志“学做圣贤”，曾国藩一直坚持用心研读圣贤经典，注

问题并要求尽快作出答复。当时任《莱茵报》主编的正是24岁的马克思。1842年，马克思便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并成为该报主编，他发表了多篇抨击普鲁士封建专制统治的文章，受到当局的记恨。由于沙培尔指责记者在《莱茵报》上撰写的文章失实，马克思作为主编必须作出回应。

莱茵省地方政府一直以来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普遍贫困的事实归咎于种植者自身，致使葡萄从业者对这种官僚主义的做法极为反感。然而，官方却把葡萄种植者对普遍贫困求助的呼声看作是无理取闹。马克思针对同一事实所出现的两种截然相反描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马克思认为，在普鲁士专制统治下，社会管理体系总是以地方政府的面号为官僚阶层服务，摩泽尔河区葡萄种植者的普遍贫困成为官僚阶层眼中的假问题，其要害在于官僚阶层把自身的利益上升为政府利益，并以政府力量对抗葡萄种植者。官僚阶层的这种偏见认知如果不消弭，贫苦农民要想改善生存状况就变得异常艰难。

马克思并没有对莱茵省总督沙培尔的“指示”作出立即的答复，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想花费一些时间尽可能地掌握详尽的材料。

深入调研收集辩护材料

占有事实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展调查研究，马克思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对总督的非难作出了回应。马克思在对“特里尔乡区和城区以及萨尔堡区的葡萄园收入数据”查阅中发现，官方发言人和协会理事会之间在计算支出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比如，“葡萄园主实行修剪侧枝和松土这些作业”是要算到葡萄园收入成本中去的，而地政局的局长却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葡萄种植者为了使自己不致彻底破产，必须试用一切办法来提高葡萄的质量。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人们应当以关心的态度去鼓励这种精神，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局却“对它加以压制”。

马克思发现，在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葡萄种植者，“无论是谨慎的还是轻率的，勤勉的还是懒散的，殷实的还是贫寒的”，都面临着这种“骇人听闻的贫困状况”，他们甚至已经到了无力养活自己的地步了，但官方却说他们在“通过夸大其词的描述，借此为自己求得种种照顾和优待”。

马克思还查阅到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某乡镇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用坦率的语言这样写道：“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从特里尔到科布伦茨，从艾费尔高原到洪斯吕克山，在物质上都非常贫困，因为这个地区的居民专靠种植葡萄为生，而由于同德意志签订了通商条约，这个行业已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地区在精神上也是贫困的……”

针对总督要求马克思拿出关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贫困状况的事例，马克思指出，决不能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仅仅看成是一种简单的状况。至少要分清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因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只有分清了这两种状况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理解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现实状况。

马克思列举了1838年一位高级行政官员巡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事例。他在询问当地一位县长关于葡萄种植者的财产状况时，得到的答复竟然是：“葡萄种植者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仅就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情况也不可能是坏的。”马克思调查还发现，《法兰克福报》第349号上登载的一篇评论，甚至荒唐地声称“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贫困状况是虚构的”。

对此，马克思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国家中某一地区的经常性的贫困状况，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

维护广大贫苦农民利益

显而易见，管理机构在消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贫困状况时所采取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措施，这些措施明显“超出了它自己的职权范围”，并莫名其妙地劝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适合于目前的管理制度，还理直气壮地说“在这种制度下他们是可以勉强度日的”。马克思在调研中了解到，这些葡萄种植者知道了这些建议后，使他们“深感痛心”，认为“这种建议是企图使他们除了忍受物质上的贫困之外，还要忍受法律上的贫困”。

针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利益纠葛，马克思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马克思确信，“这一论断至少不能认为是无稽之谈或欺人之谈”。马克思通过调查研究揭示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政府官员傲慢、偏执的态度和对法律的无视，以及自私自利的种种行径。

马克思由关注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贫苦的葡萄种植者，进而为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和法律论证，再到对造成贫苦原因的国家行政管理层面的追问，所体现的正是对贫苦农民的关怀，并把这种关怀归结到法律和政治管理的层面。与此同时，他敢于控诉官僚特权对劳苦大众的欺压与剥削，反映出他对下层民众的道德同情和道义支持，这同马克思逐步确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全人类彻底解放的价值目标是相互印证和一以贯之的。



治学以经世

——《曾文正公家书》中蕴含的治学之道

□ 杨征征



一生诚奉“敬”字

治学必以敬，才能成就真学问。“敬”是恭敬、谨慎、持重，因为心中存敬，所以更能虚心求学。在《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敬”的论述。曾国藩认为读书之士人，必须有志、有识、有恒，其中有识就是要认识到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曾国藩时刻保持对学问的敬畏心，家书中与几位弟弟谈到自己早年立志作曾氏家训一事，他说：为作家训采择经史，更知著书学问之不易，像《大学衍义》这些书乃“经史烂熟胸中”且“胸中自有条例自有议论”才能写出，因此家训要等将来自己思想更成熟连贯之时再为之。

曾国藩的“敬”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从《论语》“居处恭，执事敬”，到程朱理学“进学在于致知，涵养则在于敬”，绵绵不绝。及至曾国藩，他将“敬”作为自己修身日课的第一条，即“主敬”，要求自己“整齐严肃，无时不惧。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曾国藩之“敬”体现在敬人、敬事、敬微等诸多方面，并将之运用到治学。当六弟到岳麓书院读书之时，他专门致信告诫六弟，对待师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视之为等

夷，渐至慢夷，则不复能受其益矣”。当弟弟取得一些成绩，他也时时告诫其要持敬，且要亲历细微事。其弟在军中就职后，他说：“凡在军中，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且讲求学术。你与沅弟既然在军中，望你们能将讲求将略列为第一要务，甚至连点名看操之类的粗浅之事，也务必要亲自处理，至于磨炼胆略、预料政情等精微事情更要亲身经历，用心思索。”敬字当头、勤于学问、脚踏实地，正是这种持“敬”的治学态度成就了一个不平凡的曾国藩。

“涤”旧而生新的成长

涤者，涤旧而生新，不断反省、反思，以达“日日新”之功效。曾国藩自号“涤生”，内中就饱含了此种不断追求人格完善的期许与决心。曾国藩说到做到，在改名涤生后，他就开始了“日课”，每天都写日记，并公之让亲友监督。立志学为圣人，曾国藩一开始也急于求成，特别是早期戒烟成功，一度让他信心大涨；然而从改变行为到转变思想及至影响他人，并不简单。戒烟只不过是“脱胎换骨”中最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也让曾国藩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洗涤”的难度和重要性。他在与家人通信中多次反省自身言行：“昔年自负本领甚大，丁巳、戊午大悟大海之

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友为用。”他深知“居上位而不骄为极难”，所以严格要求自己保持理性。他说：“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不特吾之言当细心寻绎，凡外间有逆耳之言，皆当平心考究一番。”学问本身就是具有反思性的，正是这种深刻的、不断的反思、反省，使曾国藩的学问不断长进，超过时人而具有了独特价值。

“恒”常而有得的坚持

治学贵有恒，恒专而能精，恒则常也。曾国藩认为，“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曾国藩治学之“恒”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时间长，包括有长远打算，另一方面则是指用力专，不泛不散。他说，“吾辈办事，动作百年之想”，“凡行公事，须深谋远虑”，并常与其弟其子谈及自己坚持某事的感受。他指出：“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另一端则尚有恒。”“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自觉耳。”曾国藩教育其弟其子治学要讲究“看、读、写、作”之法，更要把握“专”与“精”，讲究“涵泳”功夫，力求真明白。他说：“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正所谓孜孜矻矻，必有所得，曾国藩天资不算太聪慧，但其“恒”却非常人所能及。翻开《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日记》，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就是曾国藩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形象。

